

姚江文化丛书



姚江谱牒总目提要

YAOJIANG PUDIE ZONGMU TIYAO

浙江古籍出版社

姚江文化丛书



姚江谱牒总目提要

YAO JIANG PU DIE ZONG MU TI YAO

叶树望 主 编

马晓红 副主编

浙江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姚江谱牒总目提要 / 叶树望, 马晓红主编.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1

(姚江文化丛书)

ISBN 978-7-80715-804-2

I. ①姚… II. ①叶… ②马… III. ①氏族谱系—
内容提要—余姚市 IV. ① K8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1061 号

姚江谱牒总目提要

叶树望 主 编
马晓红 副主编

出版发行 浙江古籍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责任编辑 徐晓玲
封面题字 沈乐平
封面国画 陆一飞
封面设计 计文渊
激光照排 杭州立飞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906 × 1298 1/32
印 张 12
字 数 300 千字
印 数 0001-2000
版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5-804-2
定 价 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序（一）

余秋雨

如果借用中医的经络学说，那么不妨说，中华文化经络的主干，由大河组成。姚江文化则是整个文化经络中一个很关键的穴位。但是这个问题关涉到广远的背景，请允许我在这篇序里稍稍讲开一点。

中华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河川文化。从地理意义上，北部的草原、西部的高山都是中华文化的屏障和边极，对中华文化的直接影响不大；东部和南部的大海对中华文化来说是一种陌生的存在，一直没有建立亲和关系。因此，中华文化的中心不是游牧文化、山地文化和海洋文化，而是以河川为命脉的农耕文化。河川灌溉了农业文明，又会不断地破坏农业文明，所以治水成了中华民族最原始的使命，“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一个神话。这个神话作为一种“原型”永久承传，直到今天，我们仍在做治水的大文章。

中国有四条大江，北端的黑龙江、南端的珠江，遥相呼应，囊括了绝大部分国土；而中间部位则是两大世界级的河川：黄河和长江。其中，长江为世界第三大河，仅次于南美洲的亚马孙河和非洲的尼罗河。

中国的早期文明分布很广，但最集中的是黄河流域。不仅远古时代的三大帝王尧、舜、禹都建都在现今山西、河南的黄河边上，而且

后来作为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的咸阳、西安、洛阳、安阳、开封、商丘等都城，也都紧贴着黄河。

河川哺育了经济和政治，必然也会进而哺育文化。中国先秦诸子中的大部分哲学家、思想家如孔子、孟子、韩非子等都产生在黄河下游的山东和山西，因此他们所奠定的中国思想的经典模式，也可以说是黄河岸边的思考成果。当然，大智者产生于环境又超越环境，黄河岸边的思考的影响遍及九州大地，与此相应，黄河流域的艺术文化也达到了极高水平，即便是今天的旅游者也能从一座座雄伟的古代建筑和一处处雕塑、绘画、石窟中领略当年黄河文明的气势。

但是，中华文明的中心终于从黄河文明向长江文明转移了。转移的直接原因开始与文化无关，但后来却显现出越来越深刻的文化原因。

转移的第一个直接原因是黄河的自然灾害，黄河流经北方的黄土高原，每年要挟带十六亿吨黄沙泥土下来，致使下游淤塞决堤，在近两千年中，决堤泛滥已达一千五百多次，平均每四年有三次。这种频繁的危害使黄河流域越来越难成为人民生养安息之地，更不可能保持经济中心的地位了。

转移的第二个直接原因是黄河流域战乱频仍。邦国密集、政局更迭，使黄河流域成了征战之地。每次战乱必然会带来大量民众、士人的南逃，南方本来还属荒蛮之地，却因南逃人群的开发而日益繁荣起来。尤其是公元4世纪初期的“永嘉之乱”，大量北方士庶避难南逃，直到很多年之后诗人李白仍然经常目睹南逃景象，而一见这种景象就联想起永嘉年间，他有诗写道：“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转移的第三个直接原因是逃奔的目的地长江流域平安富饶，足可

安居。长江也有洪灾，但近两千年间决堤泛滥约两百多次，平均每十年一次，只占黄河水灾的14%，再加上长江流域气候温润，雨水调和，土地肥沃，经济中心的转移有很充分的条件。

因此一般说来，晋代以前，黄河流域强过长江流域很多；由晋至唐，两河对峙；而宋以后，重心已在长江流域，越到后来，越是如此。

在世界历史上，许多次文明重心的转移常常伴随着严重的对抗，但奇怪的是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没有发生这样的对抗，两河文明很自然地交融在一起了，这使中华文明避免了一次致命的内部冲突，奇迹般地延续了生命。造成这种良好结果的原因是：

第一，长江文明早有悠远的准备和积累，底蕴深厚，高度发育，因此黄河文明在向长江文明转移的时候，并没有在文明浓度上减弱。源远流长的长江在黄河文化显赫之时，早就默默地濡养了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和吴越文化，不仅拥有先秦诸子中的老子、庄子、墨子，而且还拥有不同凡响的屈原和其他为数不少的文化大师，这使得纷纷南逃的士庶百姓不是走向荒昧，而是加入了一种新的文明。

第二，当长江文明悄然崛起的时候，黄河文明的核心精神尤其是儒家精神以其固有的宽厚和大气与长江文明建立了友好关系，重心转移变成了一种优势互补。在风格上，黄河文明雄浑、豪迈、粗砺；长江文明瑰丽、清朗、精雅，都与两河的自然风貌有关，又足以互相补益。当然，这除了两河的阔大气象外，还与两河文明同属农耕文明有关。

第三，一些以长江为生命的文学巨匠，以自己的万里行迹、开阔胸怀和精美作品，把长江文明推上了举世瞻仰的高峰地位，使文化即

便不仗经济之势也能巍然自立于历史。其中最突出的，有继屈原之后漫游于长江之畔的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等人。他们流连江滨，沉醉长江、描写长江，使长江成了一条文化上的大川，足以与黄河一起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第四，与我们这部《姚江文化丛书》有关，从明代开始，长江下游的姚江地区，开始成为中国人文思维的一个重镇，以王阳明、黄宗羲为代表的姚江学者在思维的强度和深度上都处于整个中国文化制高点的地位。这种情况，使长江下游当之无愧而又平静厚实地取得了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化的大部分总结权。此时此刻，小小的姚江所涌流的智慧，甚至已经不亚于滔滔黄河了。

任何突起的亮光总有远期的火种，姚江文化在明清两代的突然辉煌不能不让全国学人回过头去追溯地域性的历史原因。这种追溯为长江文明的履历增加了证据，特别是河姆渡文明的发现，更让人们把深长的思绪投向远古。也许，前面所说的重心转移其实只是皮相之见，把政治的集中、记述的丰富、表层的热闹当作了判定文化重心的标准？也许，重心这一概念的设定就是“大一统”观念的产物，中华文化其实一直处于多重心、也即多穴位的状态？但是，在尚未获得更多切切实实的突破性研究成果之前，我还无法放弃上述的宏观经络图谱。姚江文化，既是这一图谱的产物，又有可能改动这个图谱，这样的研究，太有诱惑力了。

历史终于推进到现代，姚江文化的魅力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改革开放以来，余姚经济发展迅速，社会日新月异，人们愈加产生了重新认识和发扬姚江文化的责任感。眼前这套《姚江文化丛书》，是在余姚市政府的主持下各相关单位合力编写的成果。格局完整、资

料齐备，充分体现了当代余姚人对姚江文化的一种自觉体认。历代余姚人总是以一种超乎寻常的文化自觉广受瞩目，这套丛书又提供了一个当代例证。

总序（二）

王永康

余姚以其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而被誉为“文献名邦”、“东南名邑”，早已闻名遐迩。自2004年组织上调我来姚工作之后，通过对城乡各地的调查、名胜古迹的探访和与各界人士的接触，我进一步加深了对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了解，增添了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感情。

这里山川秀丽，气候宜人，是风光旖旎的山水城市。放眼余姚，南屏巍巍四明山，北枕滔滔杭州湾，百里姚江横贯平原腹地。而作为全境中心的姚城，则是一水中流、四灵环抱、虹桥飞架、双城相拥的风水宝地。从四明幽谷中的道家洞天、唐诗之路，到杭州湾畔的四季绿原、观潮景点，处处都是引人入胜的佳境。如今，更成为一方旅游观光的绝好去处。

这里历史悠久，古迹众多，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姚江流域沃土遍野，宜于农耕与生活。1973年在姚江之滨发现的河姆渡遗址，以大量的出土文物，证明了早在七千年前，先民们就在这里人工栽培水稻，捕鱼打猎，构建干栏居舍，形成原始村落。余姚因而被中外考古学家确定其与黄河流域一样，同为中华民族发祥地，同为人类文明的摇篮。继新石器时代的河姆渡之后，这里又有“舜耕历山”、“禹藏秘图”之说，当代著名学者史树青教授因而认定余姚

为虞舜所出的“姚墟古迹”。

这里人杰地灵，名家辈出，是人文荟萃的文献名邦。余姚自秦时置县两千余年来，“江山代有才人出”。两汉之交的高士严子陵、东吴《易经》学家虞翻、东晋天文学家虞喜、初唐书法家虞世南、南宋名臣孙于秀等，皆名垂千秋。明清两代，这里更因孕育了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阳明），著名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梨洲），以及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朱之瑜（舜水）而蜚声海内外，以至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赞叹：“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

这里众志成城，英勇抗战，是名扬全国的革命老区。余姚人民爱国爱乡，历来有与入侵外敌、反动统治进行斗争的传统。明嘉靖年间，倭寇侵扰，姚北群众在抗倭名将胡宗宪、戚继光率领下奋起抵抗，终于荡平了倭寇。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开辟了以姚南梁弄为中心的浙东（四明山）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包括四明、三北、会稽、浦东四个地区，十四个县域的人民政权，名列全国十九块抗日根据地之一，为余姚历史谱写了光辉的一章。

这里区位优势，经济繁荣，是东南沿海的新兴城市。余姚地处浙东宁绍平原中心，东接宁波市区，西临绍兴、杭州，物华天宝，经济发达。沪杭甬铁路、杭甬高速公路和杭甬运河横贯境内，空运、海运近在咫尺，交通十分便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余姚借改革开放的东风，一、二、三产业齐头并进，城镇化建设加速推进，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升，综合实力连年排在全国百强县（市）前列。

而今，余姚这座千年古城，正以强劲的步伐，朝着经济更具实力、文化更富特色、环境更加优美、社会更趋和谐、人民生活更为殷实、

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现代和谐宜居城市目标迈进。

在沧海桑田的几千年，在改革开放的几十年，余姚人民在农业、水利、工商、文艺、教育、宗教等各个领域，创造了惊人的业绩，留下了大量历史遗迹和文史记载。继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命名为全省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后，国务院又先后确定河姆渡文化遗址、王阳明故居、黄宗羲墓和浙东区党委旧址等胜迹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余姚的光荣和幸运！

为了留存文史资料，记载前贤和今人的创业行迹，使之成为弘扬优秀文化、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生动教材，中共余姚市委、市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编辑出版这套《姚江文化丛书》。作为建设文化强市工作的重要内容，并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相衔接，争取用四到五年时间，完成全书的编印任务，以期姚江千年文脉绵延不绝，并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继承发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目 录

总序（一）	余秋雨（1）
总序（二）	王永康（1）
概论	1
凡例	17
姓氏目录	19
提要条目	24
编后记	357

概 论

谱牒，是家谱、族谱、宗谱、家乘、房谱、世谱等的总称，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历史文献。内容包括姓氏源流、家族迁徙、世系图录、人物事迹、风俗人情等，堪称家族历史的全面记录。其中最重要的是世系图录，即记载始祖、始迁祖及支祖以来的本家族历代先祖名录的那部分。

谱牒修纂源远流长，从文献角度考察，它远肇三代，完善于宋代，鼎盛于明清，一直绵延不断，直到今天。但是我们如果从考古学、民俗学层面去考察，就会发现早在文字出现之前的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晚期，谱牒就曾以结绳、口传等方式存在。这种原始形态的结绳与口述家谱，在一些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氏族中曾一直沿用或残存到近代和现代，成为民族家谱中很重要的组成形式，直至今日，我们仍可从我国某些少数民族中见到些许痕迹。

在使用文字记载的谱牒中，因载体和生成方式不同，又可区分为实物和纸本式两类。一类如商周甲骨、青铜、竹简家谱，汉代的石刻家谱等，都是实物的。如出土于清咸丰二年（1852）余姚客星山的“东汉三老碑”就是石刻性质的家谱。“三老”是秦汉时期乡级政权中主掌教化的官吏，地位崇高。碑文记录了三老及其一子九孙三代的名讳和逝世的忌日。另一类自魏晋南北朝以后的谱牒，基本上都是纸本式的，不同的是有的为手写，有的为雕版印刷或木活字排印。

谱牒文献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类型和社会功能，因而，记录的内容也不完全相同，大致看来越到后期内容越多，记录越详。母系氏族社会晚期的结绳和口述家谱，起的是优生功能。先民在蒙昧时代过着群婚制的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逐渐领悟到男女同系亲属繁衍后代“其生不蕃”的生物学原理，于是开始注重区分血缘，有了氏族集团。所以人类最原始的家谱是适应家族健康繁衍的需要而萌芽的。周代开始建立了以血缘亲疏为基础的宗法制，使用文字记载的家谱伴随着宗族的形成和宗法制度的建立产生了。由于当时的谱牒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因此直至唐代多由国家集中修录，以维护和巩固历代王朝的宗法制度。汉代分封同姓和异姓王族，等级与血缘的关系至关重要。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根据门第选官，“有司选举，必稽谱籍”，家谱是出身贵贱的证明。唐代规定由皇室和功臣组成的氏族集团为最高等级，享有特权。因此，政府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编修谱牒活动，以树立这些最高地位士族的权威，维护唐朝帝国的统治。宋代是中国谱牒史上发生重要变革的转型时代。随着科举取士制度的进一步实施，门阀士族制度遭受了致命打击，官修谱牒已经失去证明士族血缘而获取封建特权的功能，逐渐走向衰落，私修谱牒继之盛行于世，其功能也由强烈的政治性转移到尊祖、敬宗、收族方面，谱牒的教化功能增强，记载范围也扩展到整个宗族制度。当时位列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苏洵，均不约而同地各自编写了宗谱，并将创新的编修原则和具体见解、方法、体例等反映在宗谱的叙、例、记、后录之中，使得谱牒的纂修以崭新的面目逐步走向繁荣。他们的修谱理论和实践影响极为深远，被后世尊为修谱之法。至明清两代，谱牒编修已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古代谱牒，大多是明清时期纂修的。由于这时期

封建宗法制度得到空前加强，因而明清家谱中除将家族世系排列清楚，并增录传记、著述之外，又大量增加了有关反映家族制度的内容，如宗规、家训、祠堂、祠产、祭田等，人物的记述也增加了子女、婚嫁、岳家等方面的情况，从而使得明清时期的谱牒纂修更加系统，价值更高，基本上奠定了民国和当代谱牒修撰内容的基础。

由于谱牒是一种家族性和私密性很强的文献，修成之后又基本上由本族祠堂自行印刷，家族内收藏，历史上没有一个部门能够对此进行有效干预和管理，因此，余姚在历史上究竟修过多少家谱，至今尚存世多少，只能估计，而无法统计。今据《中国家谱总目》、《浙江省家谱总目提要》及余姚收藏的谱牒估计，与余姚有关的存世家谱尚有六七百种，除东汉《三老碑谱》之外，都为明清时期所修，主要收藏于上海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河北大学图书馆、余姚市文保所以及余姚、慈溪的私人收藏者手中。其中，刻印最早的为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秦氏宗谱》。其次为刊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的《余姚江南徐氏宗谱》。现藏于河北大学图书馆的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余姚孙境宗谱》是最早的手写本。根据姚江谱牒留存情况来看，共涉及余姚95个姓氏，其中王、叶、孙、杨、沈、张、周、胡、徐、黄、谢应为余姚大族。迁姚最早的为西汉元始元年（1）的严氏家族及汉代时南渡居姚、五代后周时又徙居处州辅仓的汤溪虞氏家族。其次是李氏家族，于南朝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自河南宛州迁居余姚蓝溪。姚江谱牒中存世最多的是黄氏和孙氏家族宗谱，各有31种，其次为胡氏家族27种，徐氏和周氏家族分别为24种和23种。

对这些存世的姚江谱牒进行梳理、归纳和分析，就会发现余姚现住居民大多来自中原一带。在唐代及唐代以后，促使他们徙居余姚及

其周边地区的原因大致有三种：

首先是由于战争及社会动乱的原因。中原人口曾有三次颇具规模的南迁，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至南宋初年的建炎南渡时期。当时由于金兵南侵，北宋宗室及达官显贵扈驾南渡，仕宦缙绅也纷纷举族南迁。这一时期聚迁余姚一带的人口主要来自河南地区。如丰山毛氏、姚江赵氏、余邑周氏、姚江杨氏、姚江徐氏等均迁自河南开封；兰风邵氏、开元干氏及黄山湖茅氏，则分别迁自河南洛阳和郑州；孝义王氏迁自河南宛邱；姚江叶氏迁自河南南阳。其他还有迁自江苏常州的姚江苏氏，迁自山东济南及四川绵竹的云柯张氏、云楼杨氏，迁自湖北江夏的竹桥黄氏、中村郑氏，迁自山东青州的丰山周氏及迁自江西南昌的柏山胡氏、姚江熊氏等。另外两次分别发生在唐代乾符时期的黄巢农民起义期间和五代时期。由于受北方战争频繁、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不安的影响，中原内陆人口纷纷向偏安一方、相对富庶的吴越地区迁移。当时为躲避黄巢农民战争徙居余姚的有姚江童氏、余杭姚氏以及迁自安徽的四明汪氏等家族。五代时期，如后唐时的四明黄氏、后梁时的东门翁氏、后周时的兰风胡氏等家族，分别自山东青州和江苏常州等地迁入余姚。

其次是在余姚一带任职的外地官宦，为余姚的湖光山色、风情沃土、天泽物阜所折服，离任后流连忘返，或经当地士民盛情邀留，遂择居余姚，生息繁衍。如梅川沈氏、姚江施氏、万石孙氏、双桥杨氏、竹山桥陈氏、余姚朱氏、丁山方氏、虹桥叶氏等。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家族还发展为余姚大族。

第三是赘居的原因。在古代，入赘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男子入赘女家后，其后代则改姓女方姓氏。据《秦氏

家谱》载，姚江秦氏始迁祖叶宰，南宋末时自余姚入赘慈溪慈城秦氏后，其子孙随母姓秦。另一种情况是男子虽已赘居女家，但其后代仍随父姓，这种情况最为普遍。男方大多赘自余姚周边州县，如天华符氏，北宋中叶自安吉入赘余姚金紫盛氏；北城邹氏，自会稽赘入眉山莫氏；临山俞氏及姜氏，分别于明景泰七年（1456）及南宋末年，自新昌及嵊县赘居余姚临山和姜家渡。

现存姚江谱牒如按内容分类，可分为谱系类、传记类、家史类、家典类等：

谱系类谱牒，以修录世系图表为主，其他资料甚少收录。这类谱牒在明清谱牒中所占数量不大，大多为写本或抄本。如清写本《姚江何氏草宗谱》，是为草谱，除谱序外，仅载世系及行传。

传记类谱牒，以收录家族人物传记为主，兼收家族文献。这类谱牒在明清谱牒中所占数量也不大，大多为家刻本。如清光绪十六年（1890）刻本《黄氏世德传赞》，除神位图说外，仅收录竹桥黄氏族祖的传赞及诰敕等内容。清乾隆二十年（1755）刻本《孙氏世乘》，为姚江孙氏明代名臣传记专辑。清道光四年（1824）刻本《黄氏家录》也只收录竹桥黄氏家族17人的传记。此外还有清康熙家刻本《黄氏续录》，以收录竹桥黄氏家族文献诗词、杂文为主，兼及记载本家族世系和人物传记。

家史类谱牒，不仅修录有世系图表，而且有关家族历史及人物传记等其他方面资料也多有收录，是一种家族的综合史书。这类谱牒是明清谱牒中的主要类型，一般记载内容有：古今谱序、源流考述、恩荣汇录、祖先像赞、先祖丘茛、宗族派系、人物传记、祀田祠产、遗迹遗事、家族文献、修谱考辨、附录等。因其内容丰富全面，保存了